

特大城市聚居区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情绪研究^{*}

——基于对北京的考察

李 升 赵静雅

摘要: 基于对北京流动人口聚集区的一项调查数据,研究青年女性流动人口在“积极社会情绪-消极社会情绪”两个维度上的社会情绪特征状况,通过建立序次逻辑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各影响因素的效应。研究表明: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情绪受到经济水平、婚姻家庭、劳动状况、社会感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水平越高、社会感知越良好的青年流动女性越容易产生积极的社会情绪;较高的劳动强度及进入婚姻家庭则易使青年流动女性产生消极的社会情绪。整体而言,北京地区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情绪并未完全呈现消极状态,但需持续关注其积极与消极社会情绪并存的复杂社会心态特征。

关键词: 青年女性流动人口 社会情绪 北京地区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 201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计算,流动人口的性别比已经从 2000 年的 107.25 下降到 2015 年的 101.057,性别比越来越均衡化。对特大城市而言,女性流动人口尤其是青年流动女性已成为城市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社会群体。诸多研究表明,特大城市人口流动的形态越来越呈现出家庭化迁移的特征(翟振武等 2007;侯佳伟 2009;段成荣等 2013;冯虹、李升 2016),且女性流动人口多随家属共同生活在城市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聚居区中。除此之外,聚居区中还生活着大量独自流动的被称之为“新生代”或“北漂沪漂深漂”等的青年流动女性群体,她们共同构成了特大城市聚居区中的女性流动人口。

人口流动与城乡社会结构转型是相伴相生的,对社会结构转型期中社会群体的社会心态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王俊秀 2014;周晓虹 2014),其主要理由是群体的社会情绪等社会心态能够映射变动的社会结构,对社会心态的透析能够在深层次上理解群体所处的“中国体验”(周晓虹 2014),从而更加准确地理解中国社会的转型。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流动人口生活在特大城市,她们会形成怎样的社会心态?尤其是她们中的青年流动女性社会情绪会呈现怎样的特征?

社会情绪是社会心态结构体系中具有动力倾向的核心要素,是一个社会群体成员共享的体验(王俊秀 2013),良好的社会情绪表现有助于形成积极稳定的社会行为,从而促使和谐社会秩序的生成。对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社会情绪的讨论,源自于她们在城市社会的生存实际。当前特大城市聚居区中的女性流动人口多源于一些地区的社会偏下层群体(主要是农村女性)。为了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她们像男性进城务工群体一样,努力尝试通过流动来获得更多的资源与机会。务工经

* 本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流动视角下的农民阶层分化与社会关系构建研究”(14CSH012)的阶段性成果。

商、随迁家属、婚姻和投亲靠友是女性流动的主要原因(段成荣等 2009),而且女性流动人口也更倾向于流向大城市以期实现更好的发展或过上更好的生活。

然而,女性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就业与生活并不顺畅,也产生出诸多问题。早期研究指出,由于女性流动人口缺少与城市劳动力市场相适应的就业技能及经验,多数只负责家务且没有工作,就业的女性也主要局限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商业服务业(叶文振等 2005)。后来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女性流动人口在城市适应与社会融合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林绍珍 2014;郑欣、张春琳 2014;江晓红, 2015;李荣彬 2016)。相较于男性流动人口,女性流动人口更难适应城市的工作与生活,性别和流动使女性流动人口处于双重弱势地位,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相对于年长流动人口,青年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程度更低(杨菊华等 2013)。因此,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问题更需要关注与探讨。

已有关于女性流动人口的研究多是对流动女性在城市就业生存的现状进行探讨,更关注她们的市场经济能力、性别差异及城市适应问题。这些研究指出了女性流动人口在城市就业生存中存在的问题,但对作为问题后果的社会心态的研究仍然欠缺,尤其是考虑代际差异针对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研究更少。

对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社会情绪等社会心态的探讨,有助于理解她们的共同社会心理以及对社会现实的认知,进而从微观层面深入理解她们在城市的生存状态。特大城市聚居区中的青年女性流动人口具有怎样的社会情绪?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其社会情绪的形成?基于一项对北京流动人口聚居区的调查数据,本文尝试对此问题做出实证性分析。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社会情绪的理论分析

社会学领域的社会情绪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群体的层面,主要指一定社会环境下某一群体或某些群体或整个社会大多数人所共享的情绪(王俊秀 2014)。尽管社会情绪的构成是多样化的,但一般习惯于将其分为积极、正向的情绪和消极、负向的情绪。对整个社会来说,社会情绪对社会结构和文化具有调节作用。由于积极的社会情绪是人们对现实生活所作出的满意快乐等感受反应(Fredrickson 2001),因此积极的社会情绪有利于调节社会心态,实现社会整合。与之相反,消极的社会情绪是人们源于现实生活的不满焦虑等感受,会影响社会关系的构建,甚至会导致社会冲突,从而阻碍良性社会秩序的形成。积极社会情绪可以使人形成对他人的承诺,进而形成对社会结构与文化的有效调节;而持续的消极社会情绪则会使人压抑自身并反感社会,从而使这些承诺消失,所处社会结构的整合有效性也会下降(特纳、斯黛兹 2007: 135 - 139)。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社会情绪联结了社会群体的内在心理与外在行为及社会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表征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社会晴雨表”。

在对城市中女性流动人口群体社会情绪的讨论中,已有研究主要是对其消极心态的概述。研究指出,由于受到身份制度和户籍制度等限制,流动女性被城市和农村双重排斥,因此形成了强烈的边缘人心态(姜秀花 2003;周伟文、侯建华 2010)。流动女性的边缘人心态是她们对边缘人现实位置的感受反应。在关于青年流动女性的身份认同研究中,有学者指出她们既不适应城市文明,也不愿意接纳乡村文明,而且还存在城市劳动就业上的性别差异感知,城乡与性别上的边缘化使得流动女性在心理认同上存在着交叉性与矛盾性(马冬玲 2009)。边缘人位置也使女性流动人口更容易感受到“被歧视”(李升、黄造玉 2017),更容易陷于婚姻选择与城市融入的双重困境,从而产生长期的婚姻焦虑与生存焦虑。相关研究还表明,流动女性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其他女性(刘越等, 2010),且与非流动者相比,青年流动群体对当地的情感融入度不高(徐鹏、周长城 2018)。

概括已有的研究可以推出,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边缘人位置会导致其边缘人心态的产生,进而形成消极负向的社会情绪。不过这需要做进一步的实证讨论,尤其需要探讨究竟哪些因素会影响青年女性流动人口消极社会情绪的产生。

(二) 研究假设的提出

根据社会情绪的理论分析,本研究将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情绪分为消极社会情绪与积极社会情绪两个维度进行探讨。其中消极社会情绪包含工作中的压力、焦虑等情绪;积极社会情绪则主要指在工作生活中产生的愉悦、幸福等情绪。

在消极社会情绪的讨论方面,有研究在探讨高层女性白领的压力感时指出,家庭因素中的婚姻对压力感的高低有显著影响,未婚白领女性比已婚白领女性的压力感大(顾辉 2013)。在对流动人口的研究中,有研究指出,劳动获得、劳动时间、劳动经历等劳动因素会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情绪形成,较低的劳动获得、较长的劳动时间会增强流动人口的生活压力感(冯虹、李升 2016),其中劳动工作时间等因素更是导致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出城市生活的压力情绪(胡宏伟等 2011)。

在积极社会情绪的讨论方面,幸福感知往往成为主要的分析指标。这是由于幸福感知体现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肯定态度和积极感受,具有综合性的指代意义(Diener 2000)。因此,培育积极社会情绪往往被视为与提升社会公众幸福感相统一(唐颖、李龙 2013)。早期研究已指出,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到社会情绪的形成,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其主观的幸福感知会受到社会经济相对地位的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不易产生幸福感知(Wood et al., 1989)。在对北京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已有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收入、婚姻等因素对流动人口的幸福感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叶鹏飞 2011; 杨东亮、陈思思 2015; 杨东亮、韩枫 2015; 冯虹、李升 2016; 戴宏伟、回莹 2016)。具体来说,收入水平较低的流动人口不易形成幸福感,尤其对青年流动人口来说更为明显;婚姻则更容易促使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形成。在家庭因素影响方面,有研究还指出,流动人口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很难支撑一个家庭在城市中的生活,因此有孩子的流动人口其幸福感比没孩子的流动人口更低(张华初 2014)。

此外,社会环境因素也会影响社会情绪的表现。已有研究指出,社会关系的规范程度会影响幸福感的程度(Emmons & Diener, 1986),不规范的社会关系会使人产生消极情绪。社会信任程度也会影响人们的社会情绪(Tokuda et al., 2010),社会信任程度越高,越容易使人产生积极的社会情绪。对流动人口的相关研究也表明,社会交往关系保持良好、没有受到歧视的流动人口更容易形成主观幸福感的积极社会情绪(张华初 2014; 杨东亮等 2015)。因此,青年流动女性所处的社会关系是否规范、社会秩序是否和谐等因素会影响其社会情绪的形成。她们对良性的社会环境因素感知越明显,就越容易形成积极的社会情绪。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几条研究假设。

假设 1(经济因素假设):经济状况对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情绪产生具有重要影响,收入水平、经济地位越高的女性流动人口,越易产生积极的社会情绪,而弱化消极的社会情绪。

假设 2(家庭因素假设):家庭是影响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社会情绪的重要因素,已婚流动女性比未婚女性更易产生积极的社会情绪,而有子女的流动女性比无子女的流动女性更易产生消极的社会情绪。

假设 3(劳动因素假设):劳动状况会影响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情绪,劳动强度大的女性流动人口更易产生消极的社会情绪,自雇的流动女性比受雇的流动女性更不易产生消极的社会情绪。

假设 4(社会因素假设):良性的社会环境因素会促使青年女性流动人口产生积极的社会情绪,对社会感知越积极的流动女性越易产生积极的社会情绪。

三、数据与变量分析

(一) 数据与变量说明

研究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工业大学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2013 年对北京流动人口聚居区所作的专题调研数据。调查对市场管理办公室或村流动人口管理站提供的流动人口名单进行随机抽样。总样本量为 2416 人,其中男性流动人口 1403 人,占 58.1%,女性流动人口 1013 人,占 41.9%。调查的女性流动人口中,完全不工作而只做家务

的比例非常少(不足5%),多数从事着中低端的商业服务业工作,包括产品制造加工、商品批发零售、家政保洁餐饮等。本文分析的青年女性流动人口(16-35岁)有618人,在调查的全部女性流动人口中占比为61%。

作为分析的因变量包括“消极社会情绪”与“积极社会情绪”。消极社会情绪使用在工作生活中的压力情绪(因变量1)和焦虑情绪(因变量2)来测量,前者选取问卷中的“您觉得工作和生活压力大吗”问题进行分析,后者选取问卷中的“您在工作生活中感觉到焦虑吗”问题进行分析。积极社会情绪使用在工作生活中的幸福情绪(因变量3)来测量,选取问卷中的“您觉得,当前的生活状态幸福吗”问题进行分析。

根据因变量的类别属性特征,研究选取序次逻辑回归分析(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进行模型验证,对三个因变量的操作化处理为:因变量1,认为压力很大和比较大编码为3,压力一般编码为2,压力不太大和不大编码为1;因变量2,认为很焦虑和比较焦虑编码为3,焦虑感一般编码为2,不太焦虑和没有焦虑编码为1;因变量3,认为很幸福和比较幸福编码为3,一般幸福编码为2,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编码为1。因变量操作为三个有序类别,分别表示社会情绪的“弱”(编码1)、“中”(编码2)和“强”(编码3)的不同表现程度。

作为影响因素分析的自变量包括基本属性因素、经济因素、家庭因素、劳动因素和社会因素,各自变量的操作化情况如表2所示。具体包括:基本属性因素的受教育程度、户口类别(是否农业户口)、来京时间;经济因素的月收入、经济地位(从高到低的五分赋值)、居住状况(有他人或组织提供住所);家庭因素的婚姻状况(是否结婚)、子女状况(是否有子女);劳动因素的雇佣状况(是否自雇)、劳动强度(每天工作时长);社会因素的受尊重感知(从尊重到不尊重的五分赋值)、政府满意度(从信任到不信任的五分赋值)及社会和谐感(从和谐到不和谐的四分赋值)。

(二)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

1. 因变量的分析结果

作为因变量的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社会情绪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在消极社会情绪的压力情绪方面,50.3%的青年流动女性认为自己工作生活压力大,只有12.1%的女性感到压力小,还有37.6%的女性感觉压力一般;在消极社会情绪的焦虑情绪方面,34.5%的女性持有较强的焦虑感,只有9.9%的女性焦虑感较弱;在积极社会情绪的幸福情绪方面,42.4%的女性明显感到生活幸福,将近一半的女性感受一般,只有9.2%的女性感到不幸福。

整体来看,调查的聚居区中青年女性流动人口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压力情绪和焦虑情绪,反映出这一群体具有一定的消极社会情绪;但尽管如此,作为积极社会情绪的幸福情绪并没有明显的弱化表现。调查结果反映出积极社会情绪与消极社会情绪之间存在对应上的偏差,可以认为积极的社会情绪或许成为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继续生活在北京这样特大城市的内在动力。此外,对比35岁以上女性流动人口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青年流动女性在压力与焦虑表现上的强消极社会情绪略弱,在幸福表现上的强积极社会情绪略强,表明女性流动人口在社会情绪表现上存在一定的代际差异。

表1 因变量操作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情绪类别 统计编码 (情绪表现程度)	消极社会情绪				积极社会情绪	
	压力情绪		焦虑情绪		幸福情绪	
	频数	比例%	频数	比例%	频数	比例%
1 = 弱	71	12.1(12.5)	56	9.9(8.6)	55	9.2(7.8)
2 = 中	222	37.6(34.7)	315	55.6(48.6)	289	48.4(51.8)
3 = 强	297	50.3(52.8)	196	34.5(42.8)	253	42.4(40.4)
总计(有效值)	590	100	567	100	597	100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35岁以上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情绪统计结果。

2. 自变量的分析结果

对影响因素的自变量描述性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表 2 自变量操作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	频数	赋值	变量名	频数	赋值
基本属性			经济因素		
受教育程度			月收入	均值	3471 元
1 = 初中及以下	265	42.9%		最小值	0 元
2 = 高中/中专	268	43.4%		最大值	50000 元
3 = 大专及以上	85	13.7%	经济地位		(赋值得分)
户口				均值	3.31
1 = 农业户口	498	80.6%		最小值	1(高)
0 = 非农业户口	120	19.4%		最大值	5(低)
来京时间	均值	5.4 年	有提供住所		
	最小值	1 年	1 = 有	80	12.9%
	最大值	34 年	0 = 无	538	87.1%
家庭因素			社会因素		
婚姻状况			受尊重感		(赋值得分)
1 = 未婚	246	39.8%		均值	2.57
0 = 已婚	372	60.2%		最小值	1(尊重)
子女状况				最大值	5(不尊重)
1 = 无子女	300	48.5%	政府信任		(赋值得分)
0 = 有子女	318	51.5%		均值	2.56
劳动因素				最小值	1(信任)
每天工作时长	均值	9.7 小时		最大值	5(不信任)
	最小值	0 小时	社会和谐		(赋值得分)
	最大值	20 小时		均值	2.15
雇佣状况				最小值	1(和谐)
1 = 自雇	328	53.9%		最大值	4(不和谐)
0 = 受雇	280	46.1%			

在基本属性因素方面,调查的青年女性流动人口呈现相对低学历化、以农业户口为主及来京时间较短的特征。近半数的青年流动女性只有初中及以下学历,43.4%的女性有高中或中专的学历,而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女性只有约13.7%。农业户口的青年女性流动人口占绝大多数,占比为80.6%,非农业户口的女性流动人口占比不足1/5。来京时间最短的青年女性不到一年,最长的有34年,平均时间为5.4年,整体上看青年流动女性的流入时间并不长。

在经济因素方面,调查的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劳动收入相对较低、经济地位认知度不高、有他人或组织提供居住的情况很少。从统计结果来看,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平均月收入为3471元,与同年度北京市人保局公布的职工月平均工资5793元相比,收入相对较低。青年流动女性多数认为自己经济地位一般,约有1/3比例的女性认为自己的经济地位处于低层,很少有女性认为自己的经济地位高。有他人或组织为青年流动女性提供居住条件的比例为12.9%,绝大多数女性流动人口需要依靠自己租房等解决居住问题。

在家庭因素方面,调查的青年女性流动人口多数已婚且有子女。其中未婚女性占 39.8%,已婚女性占 60.2%。青年女性流动人口中有子女的相对较多,占比超过了半数。从婚姻和子女状况的整体来看,调查的聚居区中青年女性流动人口多为家庭式流动,共同居住在聚居区中。这与前述已有研究关于流动人口家庭式流动的结论相一致。

在劳动因素方面,调查的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每天工作时间较长,且多数女性为自雇状态。调查结果显示,青年女性流动人口每天工作时长平均为 9.7 小时,表现出较大的劳动强度。在雇佣状况方面,自雇的女性超过半数,占比为 53.9%,受雇的女性占比为 46.1%。聚居区中的女性多从事中低端的商业服务业工作,很多表现为家庭式的经营方式,“前店后厂”或“前店后居”的样态在聚居区中很常见,这也造就了她们的雇佣状态及劳动强度。

在社会因素方面,调查的青年女性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受尊重感较好、对政府信任感较强且认为社会比较和谐。在对“您现在在北京受尊重程度”问题回答中,认为自己受尊重程度一般的女性约占半数,认为自己受到尊重的女性比例超过了 40%,仅有极少的女性有明显的不受尊重的感知。在对“总体而言,您对政府信任吗”问题回答中,对政府感到信任的女性比例约占半数,仅有约 10% 的女性对政府持有不信任感。在对“总体而言,您认为当前社会和谐吗”问题回答中,约 3/4 的女性认为社会是和谐稳定的,约 1/4 的女性认为社会并不和谐稳定。

(三) 回归分析结果

由于压力因素、焦虑因素和幸福因素都是有序分类型的因变量,并且反应变量个数大于 2,因此采用序次逻辑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在社会情绪的模型建构上,分别建立指代消极社会情绪的压力情绪模型、焦虑情绪模型和指代积极社会情绪的幸福情绪模型三个序次逻辑回归模型,以此具体考察基本属性因素、经济因素、家庭因素、劳动因素和社会因素五类自变量对社会情绪因变量的影响效应。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模型 1 为压力情绪模型,模型 2 为焦虑情绪模型,模型 3 为幸福情绪模型。从模型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纳入模型的分析变量是有效的。

表 3 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社会情绪的影响因素分析(序次逻辑回归模型)

		消极社会情绪				积极社会情绪	
		模型 1: 压力情绪		模型 2: 焦虑情绪		模型 3: 幸福情绪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基本属性	初中及以下 = 1	-.850** (-1.547*)	.319 (.708)	-.575* (-1.789*)	.317 (.646)	-.687*	.314
	高中/中专 = 2	-.395*	.299	-.394*	.298	-.512*	.299
	大专及以上 = 3 (参照组)						
	农业户口 = 1	.566*	.256	.289	.258	.385	.193
	非农业户口 = 0 (参照组)						
	来京时间	.065** (.039*)	.024 (.020)	.019	.023	.037* (.039*)	.023 (.020)
经济因素	月收入(对数)	-.481**	.181	-.538**	.185	.477**	.184
	经济地位	.609**	.140	.293*	.140	-.168	.140
	有提供住所 = 1	-.562*	.305	-.756*	.324	.617*	.333
	无提供住所 = 0 (参照组)						

续表 3

		消极社会情绪				积极社会情绪	
		模型 1: 压力情绪		模型 2: 焦虑情绪		模型 3: 幸福情绪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家庭因素	未婚 = 1	-.777**	.311	-.467	.308	.771**	.303
	已婚 = 0 (参照组)						
	有子女 = 1	.125 (.892*)	.309 (.479)	.040	.302	-.735*	.301
	无子女 = 0 (参照组)						
劳动因素	每天工作时长	.125*	.057	.102*	.056	-.008	.055
	自雇 = 1	.540**	.202	.423*	.209	.408*	.207
	受雇 = 0 (参照组)						
社会因素	受尊重感	-.023	.149	-.110	.149	-.881** (-.667**)	.153 (.218)
	政府信任	.082	.129	.321** (.386*)	.128 (.181)	-.123* (-.357*)	.126 (.173)
	社会和谐	.297*	.170	.322*	.171	-.467**	.167
N		465		451		472	
伪 R 方		.219		.185		.250	
对数似然估计值		816.560		769.879		780.076	
卡方检验值		97.047**		76.665**		112.533**	

注: ** $p \leq 0.01$, * $p \leq 0.05$; 括号中的数值为相同模型分析下 35 岁以上女性流动人口的显著影响因素, 与青年流动女性人口做比较。

1. 消极社会情绪的压力情绪模型分析

模型 1 显示了纳入分析的各因素对青年女性流动人口压力情绪的影响效应。从模型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在基本属性因素影响方面, 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相比, 低学历的青年女性流动人口更不易在工作生活中感受到压力, 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越容易产生压力情绪; 户口类别因素具有显著影响, 农业户口的青年女性流动人口更容易产生压力情绪; 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来京时间越长, 越容易产生压力情绪, 从效应大小上看, 流动时间每多一年, 女性流动人口的的压力情绪发生比是原来的 1.067 ($\exp^{0.065}$) 倍。

在经济因素影响方面, 收入、经济地位和居住状况对压力情绪的影响均显著。月收入越高的青年女性流动人口越不易产生压力情绪, 这与经济地位的影响效应相一致, 即经济地位越高的青年女性流动人口, 越不易在工作生活中产生压力情绪。在居住状况因素上, 有他人或组织能够提供居住条件的青年女性流动人口越不易产生压力情绪。在家庭因素影响方面, 有无子女对青年流动女性的压力情绪产生没有显著影响(但会影响年长流动女性的压力情绪), 但婚姻状况因素的影响十分显著, 即相对于已婚女性, 未婚女性较不易产生压力情绪。在劳动因素影响方面, 每天工作时长与雇佣状况因素均对流动女性的压力情绪产生有显著影响, 即每天工作时间越长, 女性越容易感到压力, 从效应大小上看, 每天工作时间每多一小时, 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的压力情绪发生比是原来的

1. $1.133(\exp^{0.125})$ 倍;与受雇的青年流动女性相比,自雇的青年流动女性更容易在工作生活中产生压力情绪。在社会因素影响方面,受尊重感和政府信任度因素对青年流动女性的压力情绪产生没有显著影响,社会和谐因素影响显著,即越认为社会和谐稳定程度低的女性越容易产生压力情绪。

2. 消极社会情绪的焦虑情绪模型分析

模型2显示了纳入分析的各因素对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焦虑情绪的影响效应。从模型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基本属性因素影响方面,只有受教育程度因素对青年流动女性的焦虑情绪产生具有显著的影响。与压力情绪模型一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越可能产生焦虑情绪。

在经济因素影响方面,收入、经济地位和居住状况因素对焦虑情绪均产生显著影响。这与模型1的压力情绪影响结果相一致,即月收入越高的青年女性流动人口越不易产生焦虑情绪,经济地位越高的女性越不易在工作生活中产生焦虑情绪,有他人或组织能够提供居住条件的女性越不易产生焦虑情绪。在家庭因素影响方面,婚姻状况和子女状况因素对女性流动人口的焦虑情绪产生均不具有显著影响。在劳动因素影响方面,与模型1的压力情绪模型的影响结果相一致,即每天工作时间越长,女性越容易感到焦虑;自雇的青年流动女性比受雇者更容易在工作生活中产生焦虑情绪。在社会因素影响方面,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和社会和谐感知会对青年流动女性的焦虑情绪产生显著影响,即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低、越认为社会和谐稳定程度低的青年流动女性,越容易产生焦虑情绪。

3. 积极社会情绪的幸福情绪模型分析

模型3显示了纳入分析的各因素对青年女性流动人口幸福情绪的影响效应。从模型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基本属性因素影响方面,受教育程度和来京时间对青年流动女性的幸福情绪产生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越容易产生幸福情绪;女性来京时间越长,越容易产生幸福情绪,从效应大小上看,流动时间每多一年,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幸福情绪发生比是原来的 $1.038(\exp^{0.037})$ 倍。

在经济因素影响方面,收入和居住状况因素对幸福情绪产生的影响均显著,表现为月收入越高的青年女性流动人口越容易产生幸福情绪,有他人或组织能够提供居住条件的女性越容易产生幸福情绪。在家庭因素影响方面,婚姻因素与有无子女因素均对幸福情绪产生的影响显著,表现为与已婚者相比,未婚女性更容易产生幸福情绪,且有子女的青年流动女性不易产生幸福情绪。在劳动因素影响方面,雇佣状况因素对幸福情绪产生的影响显著,即与受雇者相比,自雇的女性更易产生幸福情绪。在社会因素影响方面,受尊重感知、政府满意度和社会和谐感均对流动女性的幸福情绪产生具有积极的显著影响,即受尊重程度越高、政府满意度越高、越认为社会和谐稳定的青年女性流动人口,越容易在工作生活中产生幸福情绪。

4. 分析结果小结

综合消极社会情绪与积极社会情绪的不同模型来看,基本属性因素、经济因素、家庭因素、劳动因素及社会因素都会对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情绪产生具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因素对消极社会情绪和积极社会情绪两个维度产生的作用效应各有侧重。

在基本属性因素影响方面,受教育程度和来京时间变量对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情绪影响显著。青年流动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既容易产生压力与焦虑的消极社会情绪,也容易产生幸福感的积极社会情绪,教育成为影响女性社会情绪的重要变量。随着女性来京生活时间的增长,在增加了压力情绪的同时,也提升了她们的幸福情绪。

在经济因素影响方面,无论是收入、经济地位还是居住状况,良好的经济条件在弱化青年女性流动人口消极社会情绪的同时,也增强了她们积极社会情绪的形成。收入水平、经济地位较高的青年流动女性不易产生压力情绪和焦虑情绪,更有助于提升幸福情绪。居住问题是流动人口在城市落脚的首要问题,尤其对特大城市中的青年流动女性来说,有他人或组织提供住所,就能够很大缓解居住的生存压力,由此弱化她们的生活焦虑,提升她们的幸福感知。

在家庭因素影响方面,婚姻和子女都不会对青年流动女性的积极社会情绪产生积极的促进效

应。从前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婚姻会给流动女性带来工作生活压力的消极社会情绪。这与已有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与女性白领的讨论结果(顾辉,2013)恰恰相反。已有研究也表明,在北京生活的流动人口,在工作生活中苦恼和压力的社会情绪转向了“代际”的家庭方面(李升、黄造玉,2016)。即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青年流动女性既可能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工作,又要面临子女落户难、上学难、融入难等难题,家庭因素整体上弱化了她们的积极社会情绪,使她们在城市生活中产生压力与焦虑的消极情绪。

在劳动因素影响方面,工作时长和雇佣状况会对青年流动女性消极社会情绪的产生形成影响。每天长时间的工作,会使女性感受到压力与焦虑,这表明劳动强度对女性社会情绪的影响作用。而非受雇的自雇女性,更是为自己及家庭的生活努力工作,这样的内在驱动力一方面易使女性产生出幸福感知的积极社会情绪,另一方面也容易使她们产生压力和焦虑的消极情绪,这其中的内在关联机制需要立足于她们的生活实践作进一步的讨论。

在社会因素影响方面,受尊重程度、政府满意度和社会和谐感因素对青年流动女性的消极社会情绪与积极社会情绪都会产生显著影响。整体表明,青年流动女性对外在社会因素感知良好,会促使她们幸福感知的积极情绪产生而弱化消极社会情绪。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青年流动女性社会情绪的产生取决于外部社会因素的现实结果。

从与年长流动女性的相同情绪模型比较结果来看,基本属性因素中的受教育程度与来京时间、社会因素中的受尊重感与政府信任度,同样会对年长流动女性的社会情绪产生显著影响,且与青年流动女性的影响效应具有一致性,表明这些影响因素具有稳健性特征。但其他因素的影响不显著,这也表明不同代际流动女性社会情绪的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对北京流动人口聚居区的问卷调查数据,从消极社会情绪与积极社会情绪的两个维度上对特大城市聚居区中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情绪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探讨,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青年女性流动人口具有消极社会情绪与积极社会情绪并存的复杂社会心态特征。北京流动人口聚居区中的青年流动女性,虽多数在工作生活中具有明显的压力与焦虑的消极社会情绪,但同时也持有幸福感知的积极社会情绪。这表明,女性流动人口的边缘人地位未必完全导致消极社会情绪的产生。从对北京实地调查的状况来看,积极社会情绪或许是超越压力与焦虑等消极社会情绪、促使青年流动女性在特大城市北京生活的内在驱动力。因此,在讨论特大城市北京的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生活现状及其社会行为时,不能忽视其社会心态的复杂特征。

第二,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情绪产生受到经济因素、家庭因素、劳动因素及社会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经济条件水平越高的年轻女性流动人口,越易产生幸福感知的积极社会情绪,而弱化压力与焦虑的消极社会情绪,因而研究假设1得到验证。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越和谐、对社会感知越积极,越易产生积极的社会情绪,因而研究假设4也得到验证。需要注意的是家庭因素假设与劳动因素假设,一方面婚姻及有子女并不能促使青年流动女性产生积极的社会情绪,因而研究假设2只是部分得以验证;另一方面,尽管劳动强度大的青年流动女性更易产生消极的社会情绪,但劳动因素中的雇佣状况影响具有复杂性,与受雇女性相比,自雇的青年流动女性在形成消极社会情绪的同时,也易产生出积极社会情绪,因而研究假设3同样未完全得以验证。

第三,对特大城市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社会情绪的讨论要立足于其生存的实践现实。特大城市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多位于城乡结合部地区,往往被视为城市的边缘地带,生存于其中的流动人口往往被视为边缘化群体。边缘地带中的边缘群体本身就容易因角色错位、心理偏差及文化冲突等产生消极社会情绪,再加之“家庭化迁移”的流动转变及“非正规就业”的不利劳动状况,聚居区中的流动人口不易形成积极的社会心态(冯虹、李升,2016)。

对女性流动人口而言,前述的家庭与劳动因素假设之所以未完全得到论证,恰恰映射出聚居区中流动女性的生存现实:她们中的大多数是在城乡结合部地区从事家庭式自营劳动或兼业劳动(如个体式的商业服务业工作等),既要努力工作以赚取更多的收入,又要兼顾婚姻家庭。在家庭与劳动双重因素的影响下,聚居区中的流动女性并不容易产生积极社会情绪。但是她们对城市持有良好的社会感知,并且认可流动到城市后能够获得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因此也会表现出较强的积极社会情绪。

特大城市聚居区中的女性流动人口是城乡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社会群体。本研究聚焦青年流动女性的社会情绪表现及影响因素,深层次理解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城市生存体验,以此尝试探讨社会心态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逻辑。

研究在实证分析之余仍有不足。受到问卷调查中的问题所限,模型分析用压力和焦虑情绪测量消极社会情绪,用幸福感知测量积极社会情绪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纳入模型分析的影响因素也不全面,如流动女性的社会保障及生活经历因素等也可能对社会情绪表现产生影响;同时数据也难以反映社会情绪变化的特征。这些不足将是我们今后持续探讨的重要内容及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 戴宏伟、回莹 2016,《京津冀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实证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
- 段成荣、吕丹丹、邹湘江 2013,《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人口研究》第2期。
- 段成荣、张斐、卢雪和 2009,《中国女性流动人口状况研究》,《妇女研究论丛》第4期。
- 冯虹、李升 2016,《特大城市外来人口聚居区中的农民工群体研究——基于对北京的调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1期。
- 顾辉 2013,《高层白领的社会压力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当代青年研究》第6期。
- 侯佳伟 2009,《人口流动家庭化过程和个体影响因素研究》,《人口研究》第1期。
- 胡宏伟、曹杨、吕伟 2011,《心理压力、城市适应、倾诉渠道与性别差异——女性并不比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更严重》,《青年研究》第3期。
- 江晓红 2015,《女性农民工城市生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以银川市女性农民工为例》,《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姜秀花 2003,《社会转型期农村流动妇女的发展与限制》,《理论学刊》第2期。
- 李荣彬 2016,《女性农民工的阶层差异与社会融合——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研究》,《青年研究》第5期。
- 李升、黄造玉 2016,《流动人口的社会心态研究——基于2005年与2013年北京两次调查数据比较》,《调研世界》第8期。
- 2017,《流动人口的“被歧视”问题研究——基于一项对北京城中村的调查》,《北京社会科学》第3期。
- 林绍珍 2014,《女性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福建省的调查数据》,《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刘越、林朝政、黄惠娟 2010,《流动妇女心理健康状况分析》,《人口学刊》第6期。
- 马冬玲 2009,《流动女性的身份认同研究综述》,《浙江学刊》第5期。
- 唐颖、李龙 2013,《培育积极社会情绪:一个提升社会公众幸福感的新策略》,《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
- 特纳、乔纳斯、简·斯黛兹 2007,《情感社会学》孙俊才、文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王俊秀 2013,《社会情绪的结构和动力机制:社会心态的视角》,《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 2014,《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社会学研究》第1期。
- 徐鹏、周长城 2018,《新时代背景下流动青年社会融入的结构测度与影响因素——基于2017年湖北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国青年研究》第9期。
- 杨东亮、陈思思 2015,《北京地区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人口学刊》第5期。
- 杨东亮、韩枫 2015,《京津冀地区青年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青年研究》第4期。
- 杨菊华、张莹、陈志光 2013,《北京市青年流动人口行为适应比较研究》,《青年研究》第4期。

- 叶鹏飞 2011,《农民工城市生活主观幸福感的一个实证分析》,《青年研究》第3期。
- 叶文振、葛学凤、叶妍 2005,《流动妇女的职业发展及其影响因素——以厦门市流动人口为例》,《人口研究》第1期。
- 翟振武、段成荣、毕秋灵 2007,《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最新状况与分析》,《人口研究》第2期。
- 张华初 2014,《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以广州市为例》,《城市问题》第10期。
- 郑欣、张春琳 2014,《性别、传播与认同: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周伟文、侯建华 2010,《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城市化与婚姻的双重困境——S市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状况调查分析》,《社会科学论坛》第18期。
- 周晓虹 2014,《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兼与〈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一文商榷》,《社会学研究》第4期。
- Diener, E. 2000,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1) .
- Emmons, R. & E. Diener 1986, "Influence of Impulsivity and Sociabilit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50(6) .
- Fredrickson, B. L. 2001, "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3) .
- Tokuda, Y. , S. Fujii & T. Inoguchi ,2010, "Individual and Country-level Effects of Social Trust on Happiness: The Asia Barometer Survey."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0(10) .
- Wood, W. , K. Rhodes & M. Whelan 1989, "Sex Differences in Positive Well-being: A Consideration of Emotional Style and Marital Statu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6(2) .

作者单位: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李升)

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赵静雅)

责任编辑:石金群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and its Influence on Well-being: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 *Guo Zhen , Yang Ying , Zhang Mengyuan & Kou Yu(1)*

Abstract: For the individuals , the tendency to seek and achieve happiness could be divided into orientation to pleasure , orientation to meaning and orientation to engagement. All these three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could predict well-being significantly. Through achieving more resources for individuals , the orientation to meaning and orientation to engagement could increase their well-being; whereas through improving short-term emotion for individuals , the orientation to pleasure could increase their well-being.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individual factors could influence the formation of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for the adolescents , the three types of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are relatively low. The future study should emphasize the following aspects: deeply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individual factors on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tracking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 in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revealing the mediating process in the influence of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on well-being; improving the methods of measuring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Keywords: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Well-being Orientation to Pleasure Orientation to Meaning Orientation to Engagement

The Social Emotion of Floating Young Women in Mega City's Settlement Area

..... *Li Sheng & Zhao Jingya(10)*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regardi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settlement area in Beijing , this paper tries to study the floating young women's characteristic condition of social emotion in two dimensions , namely "positive social emotion" and "negative social emotion". By using the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 we try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each influencing factor.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 the young floating women's social emotion could be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economic level , marriage and family , labor condition and social perception , etc. For young floating women with higher economic level and better social perception ,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generate positive social emotion; whereas higher labor intensity and entry into marriage and family are more likely to generate negative social emotion. On the whole , for the young floating women in Beijing area , the social emotion doesn't only display negative state. However , we should continually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ir complex social mentality ,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existence of positive social emotion and negative social emotion.

Keywords: Floating Young Women Social Emotion Beijing Area

The Pathways in the Formation of Differences in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d its Mechanisms

Jiao Kaishan , Yu Xiaohan & Jin Miao(21)

Abstract: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fferences in mental health among college students from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status , and the influencing pathways and mechanisms of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status; the social capital and self-efficacy are two important mediating factors. This could further confirm that mental health status is the result of a combination of socio-economic factors and mental mechanisms. In order to prevent and intervene the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 we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cognitive and mental mechanisms behind ,but also consider the factors including college